

闽台文缘
系列丛书



文学艺术研究

闽台文缘编委会 编著



文学艺术研究

闽台文缘编委会 编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台文学艺术研究/闽台文缘编委会编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5
(闽台文缘系列丛书)

ISBN 978-7-5550-0810-1

I. ①闽… II. ①闽… III. ①地方文化—文化研究—福建省②地方文化—文化研究—台湾省 IV. ①G127.58②G12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4353 号

闽台文学艺术研究

闽台文缘编委会 编著

责任编辑 何欣

助理编辑 刘含章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金山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810-1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祖国作为台湾现代文明的重要输入源述论

——以日据时期台厦场域为实例的文学观察 朱双一 /1

现代性视野中台湾《创世纪》诗人之诗学观 俞兆平 /18

生成、繁荣与变迁

——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陆与台湾乡土文学 罗关德 /32

口述于闽台之间

——闽台民间文学关系研究 夏 敏 /43

相通的文化想象与共同的情感诉求

——闽台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戴冠青 /68

三十年来福建民间文学研究概述 林蔚文 /79

略论中国仪式戏剧之演进

——以闽台戏剧为例 骆 婧 /96

歌仔册《周成过台湾》的叙事艺术

——竹林书局刊本与杨秀卿说唱的比较与分析 洪淑苓 /110

福建宋杂剧的发现及其戏剧形态考探 叶明生 /132

昆曲传入福建及其影响新探 杨 榕 /163

浅谈两岸高甲戏的交流及影响 吴慧颖 /177

祖国作为台湾现代文明的重要输入源述论

——以日据时期台厦场域为实例的文学观察

朱双一

从 1895 年起，台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但与一般的东方殖民地有个重要区别，即它不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被殖民，而是还存在着一个“祖国”，尽管“祖国”当时也处于“半殖民地”状态下。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说法，某地沦为殖民地后，其历史和文化顿时化为空白，这种情况在台湾表现得并不典型，其原因或许就在台湾还有“祖国”的存在。而这“祖国”，正是台湾固有的文明输入来源。台湾人作为开发海岛蛮荒之地的移民，大陆历来是其心目中的“文明中心”，他们从祖国大陆携来文明，其后代也仍不断地从父祖之乡接收文明成分，包括农耕技术、儒家观念制度等。以往我们只注意到台湾从殖民宗主国日本接收了“文明”，却忽略了大陆是台湾的另一个历史更长久，且由于血脉语言的相通而更为方便、更为主要的文明输入来源，而且这种“习惯”——历史的惯性——并不会那么快就消失和转变。进一步而言，台湾接收“现代”、“文明”，除了殖民宗主国，其实还有“祖国”一途，且通过祖国接收“现代”更能满足其民族情感以及避免“殖民现代性”的为害。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就是台湾从祖国而不是仅从日本接收现代性的明显例子。

一、厦门作为台湾现代文明的重要输入源

台湾将祖国大陆当作其“文明”的主要接收源由来已久，即使标榜将给台湾带来现代文明的日本殖民统治，也无法阻止这种强大的惯性。因厦门（扩大了是闽南乃至整个福建）历来就是由大陆往台湾移民的主要出发

地，因此也历来是台湾从祖国接收文明的重要窗口之一。1920年前后，许多台湾青年前往日本留学，而前来厦门就学的台湾青年也不在少数。这种现代文明由厦门输往台湾的“渠道”，早在日据之前就已开启，日据之后仍延续着，且比起日本“渠道”，毋宁对台湾同胞更具吸引力。这一点，似乎连日本殖民者也颇为明白。早期的台湾“总督”便极为重视且努力经营所谓“对岸”政策，除了在长期目标上将福建作为扩张其“南支”、南洋势力的据点和跳板外，同时在近期动机上，希望基于福建与台湾的固有密切联系，起到收拢人心的作用。台湾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就曾在1899年6月发表《有关统治台湾过去及将来之备忘录》，其中明确写道：

“对台湾岛民的统治，欲收十全的效果，不能只着重于岛内的镇压及民心的收揽，必须留意对岸之福建省，尤其是厦门的民心；察其民心之归向，再将其反射于台湾岛之安定政策上，如此方能达到统治之目的。”^①又认为：

“台湾本岛缺乏天然良港，但如将眼光放大，且依照帝国（日本）占领本岛之原意而经略，自可发现东亚有数之良港——厦门港——附属于本岛，并且几百年来已为台湾岛民所利用。”^②在具体操作上，则以台湾银行厦门分行的开办最为重要。其开设，一方面可掌握台厦之间以及厦门与其他各地之汇兑权，通过“吸收中国人之存款，可提高中国人对帝国（日本）发生利害与共的观念，随而可提高帝国在厦门的威信，而由其反射作用，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必然可收加倍之效”。另一方面，后藤新平认识到“厦门是台湾的中心，至少在历史上，厦门是控制台湾财经界的中心”，台湾银行之营业范围若止于台湾本岛内，其存款最多不出一千万元；如在厦门开设分行，而在商业上占优势地位时，其存款不知将达几千万元；如果能以经济比较繁荣的闽南游资开发荒芜的台湾岛，将可减少日本中央政府对台湾财政的挹注。^③也就是说，日本殖民当局欲延续固有厦台之关系，吸收厦门一带之资金，以供台湾的建设。由此印证了厦门、福建乃至整个大陆，历史上曾经是，当时也仍旧是台湾的一个文明输入源。

当然，由厦门（大陆）输入台湾之“文明”的具体内涵，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是物质层面的（如上面所说的台湾银行所吸收的资金），也可以是制度层面的（如历史上中原政经体制的播迁），还可以是精神、观念层面

①②③鹤见祐辅：《后藤新平》，转引自梁华璜：《台湾总督府的“对岸”政策研究》，稻乡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6～47页。

上的（如儒家观念）。而从近代以来，新兴思潮可说是台湾吸收来自大陆“文明”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有“清季台湾第一洋务思想家”（吴文星语）之称的李春生，即是由厦门将“现代”因素带入台湾的一个显著例子。鸦片战争后，厦门开放为通商口岸，基督教英国长老教会在厦门获得传教权七年后（1851年），14岁的李春生即受洗成为基督徒，此后便热心于研习英语，并自学汉文、“四书五经”、中外史学、地理、哲学与新旧约《圣经》，可说中西、新旧兼修。18岁时曾游历上海、宁波、福州、潮州、高雄、台南等地。20岁时赴香港学习英语，后任职厦门英商怡记洋行从事洋货及茶叶贸易。24岁时在厦门自营四达商行兼营茶叶。1865年28岁时，因遭太平军影响事业停顿，便经怡记洋行店主爱利士介绍，与苏格兰商人杜特结识，成为台湾宝顺洋行买办。1869年与杜特于淡水试种乌龙茶成功，船载21万斤茶叶到北美纽约销售，大受欢迎，自此台湾茶叶直销欧美市场。1872年马偕牧师至淡水传教，李氏极力协助。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李春生首论营台策略，撰《台事》七篇，投稿香港《中外新报》，建议与日议和后，加强台湾防务，移民垦台。1875年后，他历任清廷洋药厘金局总局监察委员、台北城建筑委员、大稻埕港岸堤防修筑工程监造委员、蚕桑局长、台湾铁路道敷设委员等多种职务。1896年，他汇集1873至1895年投刊于《中外新报》《万国公报》之各篇而成《主津新集》出版。^①今人吴文星归纳该书主要内容时指出：“李氏二十年间反复申论者，在于吁请当局因时变法，强调富强首务为修天道、革吏治、兴西学、置日报诸端。”^②又指出：“当西教仍为大多数时人视为异端时，李氏竟独排众议，指称其为中国变法图强之大本，足见其瞻识非凡；同时，其改造国民性格以应变法之需之主张，的确极为高明正确而无所争议。”^③李春生显然属于较早接受“现代”洗礼的人物，而这得益于他作为厦台之人而具有较早接触西方文明的条件和视野。这一事例也可说明，由于较早成为通商口岸和西方文化较早进入，厦门的“现代化”进程走在台湾前面，而在日据之前，台湾的“现代”因素主要由大陆输入。

① 张季琳编纂：《李春生相关大事年表》，见《李春生著作集·附集》，南天书局2004年版。

②③ 吴文星：《清季李春生的自强思想——以变革图强议论为中心》，见《李春生著作集》第二册，南天书局2004年版，第291、302页。

日据后,不少台湾文人内渡或来往于两岸之间,他们从厦门(闽粤)等地接受了许多“现代”的因素。像内渡文人施士洁深觉阅读世界历史具有开阔视野的作用,其《法兰西国大革命歌》写道:“老民蛛隐心太平,未读西史犹孩婴”。读了之后,则对西方政治经济等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制度多所了解,可以史为鉴。他从严复所译《天演论》中“合群”之说中获得启发,促使晋江施氏宗族由分裂争斗转化为整合认同。^①又如,许南英于1903至1904年间在广东阳春任知县半年,调离时作《留别阳春绅士》六首,从中可见他当时颇受新思潮影响,倾向于学习西洋新法,改革图强。其第三首对当地人因观念保守而未开采丰富之地矿表示惋惜;第五首中,作者对中国、亚洲日渐落后于西方充满忧虑,呼吁学界改良,自强保种。1909年所作《台感》中,则有“天演例原优者胜”之句;《秋怀八首和邱仙根工部原韵》中有“黄种近编新宪法,青年待起自强军。暮笳晓角何悲壮,爱国歌声动地闻”的诗句,对革新自强、卫国保种行动加以赞颂。后来许地山在《窥园先生诗传》中说他父亲当时“对于新学追求甚力,凡当时报章杂志,都用心去读;凡关于政治和世界大势底论文,先生尤有体会底能力……他底诗中用了很多当时底新名词,并且时时流露他对于国家前途底忧虑,足以知道他是个富于时代意识底诗人”^②。许南英曾数次返回台湾,必然将其接受现代新事物的心得与其台南“南社”诗友相交流。

自乙未割台之后,“雅堂渡海旅居厦门,十年间凡四次。十八九岁时,日军进入台南,父丧,到厦门寻求升学就业出路,皆无成”;二十四五岁时“马兵营故园被日人购筑法院宿舍,族人星散,到厦门捐监,赴福州应经济特科乡试,不第,留厦门主鹭江报笔政。二十七岁侍外姑王氏,渡海省视外舅病月余”。^③其《剑花室诗集·外集之一》所收诗作,说明从乙未至辛亥这十多年间,作者深受新思潮影响。《读西史有感》中有“登天早信非难事,缩地于今亦有方。一自杀蛙生电后,上天下地任翱翔”诗句,表现了对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关注。他对西洋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也颇多吸收。《读卢梭民约论》诗云:“平生最爱卢梭子,民约思潮涌大球。革命

① 汪毅夫:《近代台湾文人在福建》,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18页。

② 许赞堃:《窥园先生诗传》,见许南英:《窥园留草》,龙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46页。

③ 曾迺硕:《连横传》,1997年版,第44页。

已成专制死，文人笔战胜王侯。”此时对连雅堂触动最大的是严复所译《天演论》中所传达的进化论思想和自强保种精神。《丙午除夕书感》写道：

六载混溟握笔权，又从鹭岛筑文坛。
漫谈天演论成败，一例人生孰苦欢。
君子乘时能豹变，英雄末路且龙蟠。
年华如水心如火，弹指风光岁已阑。

此诗写于1907年初。早几年，连雅堂从大陆返台后曾担任《台澎日报》社汉文部主笔，工作之余，他学习了日文，阅读了日本维新史，接触了海外革命、维新两派的理论，并曾到厦门、福州等地，考察当时国内形势。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连横携眷渡厦，与人创办了《福建日日新报》，所办报纸由于鼓吹反动，得到南洋同盟会赞赏，引为同道，曾派闽人林竹痴来厦，商议将报纸改为同盟会机关报。该报还积极参与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等，报馆被清政府关闭，连横才被迫返回台南。在厦门，连横还有《留别林景商》，其中有云“合群作气挽洪钧，保种兴王起劫尘。我辈头颅原不惜，共磨热力事维新”，表达了团结一致，力促维新，以保民族生存的决心。又有《作客鹭江，次庄仲渔旅次题壁》一诗，除了接受“尘尘世界无公理，民族生存日竞争”的进化论观念外，并表示了要走在时代的前列，率先接受新思潮、新观念的意愿。

1904年4月，连横于厦门《鹭江报》旬刊第六十一册上发表《惜别吟诗集序》，表达其对女权运动的看法。文中写道：

台南连横归自三山，留滞鹭门，访林景商观察于怡园，纵谈人权新说，尤以实行男女平等为义。酒酣气壮，景商出诗稿一卷，云为榕东女士苏宝玉所著，其身世详于乃兄千宝序中。连横读竟而叹曰：中国女权不振，一至于此欤！三纲谬说，锢蔽人心；道德革命，何时出现……晚近士大夫倡言保种，推原于女学不昌，是诚然矣……宝玉生于寒门，明诗习礼，因父醉语，误适非人，时年犹未笄也。向使女权昌炽，人各自由……何至含苦难言，寄托于吟咏间，自写其抑郁牢骚之气……余不为宝玉责，而特罪夫创“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者之流

毒至此也。同此体魄，同此灵魂，男女岂殊种哉？而扶阳抑阴者，谓女子从人者也，奴隶待，牛马畜，生死荣辱，仰息他人，莫敢一破其网牢。若曰此女诚也！此妇道也……近者中原志女，大兴妇风，设女学、开女会、演女报者接踵而起，宝玉丁此时势，埋没于荒陬僻壤，不获与吴撝芬、张竹君、薛素琴辈把臂其间，宝玉诚不幸矣！犹幸其能以诗传也。呜呼！中原板荡，国权废失，欲求国国之平等，先求君民之平等；欲求君民之平等，先求男女之平等。洒笔书此，以告景商，并以质天下之有心人。

文末注明壬寅冬十月望日书于“鼓浪洞天之下”。连雅堂在1902年就对“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大声挞伐，并将其当作追求国家之间平等的基础，如放在十多年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也并不逊色，可知其走在时代之前列，同时也令人想起稍早的林纾的《兴女学》《谢兰言》等作品。

另一波更大规模地从厦门接受新思潮，是20世纪的一二十年代。当时来厦就学的台湾青年骤增，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台湾青年得以大量接受祖国新兴思潮的熏染。赖和来厦虽非留学而是任职于医院，但扩大视野、接受新知也是其动机之一。除了因长男早夭、心情郁闷，时为同盟会会员的好友翁俊明迁居厦门，以及为了反日而离开台湾，欲以总督府医官的身份为掩护，施仁术以救济大陆同胞的病苦，且方便观察大陆的政情等之外，从《归去来（由厦门博爱医院挂冠时作）》一诗中的“吾生仍坠仞利宫”、“冥蒙秽毒神所弃，复为摈之东亚东”、“四顾茫茫孤岛屿，昂头无隙见苍穹”、“欧风美雨号文明，此身肮脏未由沐”、“雄心郁勃日无聊，坐羡交交莺出谷”等诗句中，或还可推测赖和不愿拘囿、困守于台湾孤岛上，希望通过大陆之行，开阔眼界，接受更多现代文明的洗礼。后来赖和鼓励其五弟赖贤颖赴厦门入集美学校，说明赖和将厦门视为台湾青年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之渊薮。

赖和离开厦门的前一两个月，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他显然已感受到“五四”追求科学的精神，此后作品中时常出现的反迷信主题，在此已露端倪，如《仙洞》一诗中有“媚世僧多鄙，祈灵俗尽同”之句。除了游览景观，流连于郑成功相关古迹遗存以接受民族意识的熏染外，赖和的视

线还流连于周遭的社会现象和民众生活，祖国的贫弱战乱、民不聊生的状况，给赖和深刻的印象，对于他后来的救国救民志向和反帝反封建文学主题的确立，有着深刻的影响。《厦门杂咏·乡村》写道：“万家烟突几家生，破屋斜阳户不扃。零乱瓦砖余劫火，流离骨肉感飘萍。数声野哭云沉黑，满眼田荒草不青。匪患初安兵又到，一村鸡犬永无宁。”当然，赖和更为关心的是整个中国。《同七律八首》之四写道：“茫茫大陆遍疮痍，虫病方深正待医。蠢豕直成真现象，睡狮犹是好名词。未尝世味心先醉，听惯民声耳亦疲。如此乱离归不得，排愁无计强吟诗。”给林肖白的诗则写道：“莽莽神州看陆沉，纵无关系亦伤心。回天有志怜才小，填海无功抱怨深……”这些诗充满了对于贫弱、战乱中的祖国的忧虑，同时还极为深刻地提到了医治国病的问题。《于同安见有结帐幕于市上为人注射玛啡者，趋之者更不断》一诗，开头更明确地写道：“人病犹可医，国病不可医。国病资仁人，施济起垂危。今无医国手，坐视罹疮痍。”^①诗人似乎已认识到还有比医治个人的肉体病痛更为重要的，这就是医治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之病及国民精神之病。鲁迅正是由于认识到医治国人的精神病症比医治肉体病症更为重要和迫切，因此“弃医从文”；而赖和作为一个医生，后来虽没有“弃医”，但同样走上文学的途程，这一人生道路，和鲁迅是颇为相似的。而这和赖和在厦门时亲身观察和感受到的祖国的贫弱及其国民的精神病症，应不无关系。这或许是赖和的厦门之行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最深远影响之所在。

与赖和相比，张我军的厦门之行更有着开阔视野的直接意义。刊载于1926年2至3月间《台湾民报》的《南游印象记》描写作者出行到台湾南部，过了新竹，渐渐便看得见碧蓝的海——“我每次看了海，似回到故乡，遇见爱人似的。实在，海是我的故乡，是我的爱人。我看了海，就有无限的感慨。”接着说明其原因，竟是两年的厦门生活所致。他写道：“自今五年前，我从基隆搭船到厦门，这是与海接近的第一次。自是，在厦门、鼓浪屿辗转过了两年。这两年之间，我受了海的感化和暗示不少。早上，太阳将出未出之时，我站在岩仔山腹的洋楼的栏杆之旁，两眼注视那苍茫的大海，一直到尽处——是海是天已分不出的地步——凝视着、放歌、驰想……晚上，

^① 本小节所引赖和的汉诗作品见林瑞明编：《赖和全集》第五册《汉诗卷》，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393页。

月亮刚上了山头，照得一面白亮亮的银海，我站在山腹，两眼注视那白茫茫的银世界，一直到尽处，凝视着、放歌、驰想……”大海对于张我军，竟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写道：“自从领略了海的感化和暗示之后，我就不想回到如在葫芦底的故乡了。后来再奔波各处，数年之间，不断地与海相亲。现在不得已已在狭窄的笼内过狭窄的生活，还时时想要乘长风破万里浪，跳出台湾，到海的彼方去！”由此可知，在厦门的两年生活，堪称张我军“一生的转折点”（张我军哲嗣张光直、张光正语），使他跳出了比较保守、陈旧观念的拘囿，走向了海洋，在海洋精神的洗礼和激荡下，形成了开放、进取的思想观念，这对他接受“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摒弃陈腐的封建旧文化和旧文学，应具有关键的意义。其中对于台湾故乡有如“葫芦底”的评价，与当前所谓日本殖民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的说法，大相径庭。

赖和五弟赖贤颖求学厦门后，又考上北京大学，因此成为赖和阅读大陆书刊的重要来源管道。其小说《女鬼》^①写了人物在旅厦后所受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当时台湾相对守旧，封建礼教、迷信等昌炽，这应与日人的愚民政策有关。林家城医学院毕业后不愿回乡开医院，却往厦门去了，回来愈加古怪起来了，什么“老人可以讨伙计（小老婆），倒不准许少年人娶个意爱的女子”这样的话，使自己得了“古怪先仔”的称呼。但那样一个时代，世界本身不就是古怪的吗？什么坦克炮车、潜水艇、瓦斯炮接踵而至，“林家城当时在厦门……适逢那四三千年来的老大国，又正乱着洪洪洋洋地吼叫着新生的大合唱，精壮结实的一般青年，全都擎起了新的建设的旗帜，直向光明的去处迈进着”，林家城的心难免为之所动。返台后听到的又尽是“诸种税款愈征愈重了”、“物价越腾贵了”等等“挣扎着只求一活的呻吟”，加上自己将被迫与无智识的陌生农村女子一起生活，于是脸上越发浮现“干涩钝凝的微笑”。小说写出了在大陆受到“五四”新思潮激荡的返乡台湾青年与仍相对落后、保守、迷信的社会环境的矛盾。“家城先”被称为“古怪先仔”，其实真正“古怪”的是当时的台湾社会。这与鲁迅书写“疯子”、“狂人”，具有相同的旨趣。

除了启蒙思潮外，厦门还是台湾接受左翼革命思潮的重要来源地之一。共产党人翁泽生、蔡孝乾等，都曾来到闽南就学和从事革命活动。20世纪

^① 赖贤颖：《女鬼》，见钟肇政等编：《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

20年代前期的集美学校，聚集了一批进步教师（其中不乏作家、诗人），一波又一波进步学生运动（学潮）迭起，而“台湾革命僧”林秋梧、“台湾话文运动”倡导者郭秋生，其时都曾在集美学校学习或工作过，难免受其熏染。厦门（祖国）还是在台岛从事抗日革命活动的左翼青年的向往之地或“大后方”。台湾农民运动先驱者李伟光（即李应章），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彰化，从小祖母就把日本侵占台湾时的残暴情状讲给他听，并称死后要把骨头搬回唐山去。父亲因没有中医的正式执照，常被日本员凌辱或罚款，给李应章种下了抗日的思想种子。他七岁时进私塾学汉文，在家加学“四书五经”。在学校里曾和同学结拜，誓要反抗日寇。公学校毕业后，在家里的中药铺当学徒，自学《伤寒论》《脉学》等中医书，也看了不少诗词、《饮冰室文集》以及《水浒传》等文学书籍。因不甘心埋没于农村，经努力上了彰化商业实业科。该校学生思想活跃，要求图书馆订购北京《新青年》杂志，从中了解了祖国进步思想，喜爱诗词的同学组织了“艺吟社”，经常集会作诗联吟。1916年李应章考上了台北医科专门学校，他曾在课余组织诗社，又和同学组织“弘道会”准备进行反日活动。他常到书店阅读日本左派书刊，如大杉荣、山川均等人的著作，同时受到北京《新青年》的启发，曾发起反对“舍监”贪污行为的学生会活动。祖国“五四”运动消息传来，给他带来很大刺激，又因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民族自决潮流的影响，奠定了他民族意识的基础。他和一些同学一起，于学校地下室，在所谓的“始政纪念日”当天秘密举行了“岛耻纪念日”集会，向当时祖国的五色国旗行礼，表示决心。1920年医学校将毕业时，他和同学们一反过去到日本“修学旅行”惯例，组织观光团到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旅行——经厦门、汕头、香港到广州，参观了黄花岗烈士墓和孙中山的军政府等，听一位中学校长兼军政府议员的介绍，受到很大鼓舞。通过这次旅行，他体会到祖国革命的伟大，并目睹了日本人到处耀武扬威，更确立了自己要走的革命道路。

返台后，李应章参与了台湾文化协会的组建，在家乡的实际调查、活动中对糖厂的剥削制度有了深刻了解。他组织农村讲座、夜校，亲自当讲师，还编了用闽南语唱的《甘蔗歌》，于1925年元旦召开蔗农大会，议决组织蔗农组合，成为近代台湾的第一个农民组织。组合成立后，要求厂方提高甘蔗收购价格并取消不合理制度，在遭蛮横拒绝后，决定发

起斗争。李应章因此被捕判刑入狱，其间曾由日本著名进步人士麻生久保释暂时出狱。在监狱的苦役中，李应章曾写下一首以中国传统的诗歌意象来象征自己的品格和气节的诗：

朔风凛冽铁窗寒，短袖红衫（日本囚衣）一领单。
幸得身如松与柏，凌霜傲雪不凋残。

李应章出狱后才知道服役期间家被火烧毁，父亲病故。他继续组织蔗农争取权利，发动了不种植甘蔗运动，迫使厂方接受蔗农要求。1930年10月，台湾民众党在彰化开会时，李应章反对日本殖民当局要求该党修改阶级斗争纲领，发表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激烈言论，再次遭遇日本员警的搜家警告。于是李应章设法于1932年正月初一离开台湾前往厦门，在鼓浪屿开设了神州医院，并找到了共产党组织。后来组织遭破坏，他来到上海，开设伟光医院，继续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并时时关心台湾，曾编辑出版革命刊物送入台湾，也曾领导在上海的台湾同胞的活动。1932年离台前前往厦门时，在船上咏得一首七律诗：

十载杏林守一经，依然衫鬓两青青。
侧身瀛海豺狼满，回首云山草木腥。
潮急风高辞鹿耳，鸡鸣月黑出鲲溟。
扬帆且咏归来赋，西望神州点点星。^①

所谓“西望神州点点星”，正说明大陆是台湾同胞脱离虎狼之地的寄望所在。李应章曾表白他前往厦门的重要原因：深刻地认识到如果祖国大陆革命没有成功，在台湾无论怎样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这种将台湾摆脱殖民统治的希望寄托于祖国革命成功和强盛的思想，在当时的台湾同胞中，是颇有代表性的，并展现了台湾文学走向“本土化”的必然趋向。

^① 李玲虹、龚晋珠主编：《台湾农民运动先驱者——李伟光》（上卷），海峡学术出版社2007年版。

二、与“殖民”并行的“本土化”现象

日本统治台湾后，日本人和台湾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十分复杂的情形，其间既有对立和对抗（武装的或文化的），也有笼络和谄媚。在一般民众之间，有时还建立了亲密的友情，甚至基于共同的阶级立场和革命目标而成为休戚与共的“同志”，如日本进步人士麻生久就曾搭救过因发起蔗农运动而入狱的李应章。施士洁在闽南也与日本人有颇多往来，如日本诗人袖海馆森鸿、串宇铃村让，日本驻厦门领事官菊池义郎，旭瀛书院掌教小竹德吉，以及在厦五年的诗友山吉盛义（米溪），短期来厦观光的青山洁、水野、伊藤欣造等，都相与酬唱。即如近代爱国诗人许南英返台参与南社活动时与日人唱和，其中也有一些具有媚日倾向的诗句。不过，它们有的是特定背景、条件下的产物，有些明显是应景之作，应作具体分析，而不必一味苛责。^①其实，施士洁、许南英，以及内渡后对厦门的建设贡献颇多并在鼓浪屿建立“菽庄花园”、创设“菽庄吟社”的林尔嘉等，其诗作中都充满了“弃民”、“遗民”的感吟和民族意识情感的坚持和守护。如果说，所谓“本土化”的含义在于殖民地人民以固有传统文化作为对抗殖民者的武器，它以民族意识、情感为基调和触媒，那上述台湾诗人的不少诗作已具有明显的本土化倾向。如施士洁《后苏龛合集》中多次出现“吾华”、“吾国”等词语，明白昭示其民族认同。其《赠日本医士贵岛旭园健，时将由厦渡台》诗云：

文明播殖又瀛东，肘后千金国手雄。
一自好风吹鹭厦，蓦然春气遍鸿蒙。
求师愿下长桑拜，赠句深惭短李工。
从此隔江云树渺，何时把钓访涪翁。

吾华千载岐黄术，传者如今有几人？
卢扁支流承二圣，海山初日照三神。
能医俗骨方医病，先活良心次活民。
独我知君醒世旨，白云来去了无尘。^②

① 张宁：《许南英评传》，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2、51页。

② 《台湾先贤集》第三册，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648页。

诗中肯定了日本医士来厦行医为传播文明之举，但更多是对贵岛氏传承中医的称誉。如果联系到当时鼓吹新思潮、新文化者，大多对中医嗤之以鼻，而施氏却对中华医学饱含着崇敬之情，令人感受其对中华传统的特殊情怀；至于“能医俗骨方医病，先活良心次活民”，更与稍后赖和的医“国病”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台湾同胞在厦门所滋长出的民族意识和“本土化”倾向，与他们目睹台湾总督府的“对岸”政策所造成的对闽厦的伤害有密切的关系。台湾籍民问题是这种严重伤害之一。赖和在其《厦门杂咏》诗中有云：“门牌国籍注分明，犯禁公然不少惊。背后有人凭假借，眼中无物任纵横。”抨击的正是某些被称为“台湾呆狗”或“日籍浪人”者，依仗日本帝国的权势和保护，在厦门胡作非为的情形。翁泽生仅见的一篇小说作品《谁误汝》^①，写一位名为“台魂”的台籍青年在月色笼罩的返台船只甲板上，一边向故乡父母和祖国表达其爱慕怀想之情——“啊！中华！故国！我很爱慕汝，很盼望汝，我们旧同胞！我希望我们汉族的提携，赶紧起来，打破无公理的强权，（恢）复我们的自由，建造我们光明的新世界”，一边却洒下深深忏悔的眼泪——原来，三年前“台魂”胸怀远大高尚的志愿，从台湾西渡来到厦门，未料却和一帮不三不四的台湾同乡混在一起，挂起日本籍民招牌，“仗了领事的护符”，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干起虐待旧同胞的事来。如到中国人家去收账比前清官员更凶一倍，人家来收账就待其如同乞儿一样，另外还设赌场、开烟馆，本想得些横财衣锦归乡，哪知天天抽鸦片、逛娼寮，连鸦片馆和赌场的资本都用尽了，最后发展到当强盗，仗着“汝们政府有什么办法来办我们呢”的特权和蛮横，持枪洗劫钱庄。想到这些，“心脏更觉痛悔，更加苦楚”，“忽然从他喉中，一道红血水龙似的喷出来”，身子战栗非常，泪流如雨；他“凝视那高尚的月儿，慢慢向东方行了最后的敬礼”，一道黑光般投入海中自尽。月光和海波声似在哀吊这位可怜的青年。“领事裁判权误我！”“领事裁判权误我！”台湾海峡的流水，千古回响着“台魂”的这一哀音。小说反映的同样是某些“日籍浪人”在厦门为非作歹的情况，其主题词则是“忏悔”和“反省”——小说的主角不以日籍身份和具有“领事裁判权”的庇护而自得，而是深切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可耻和可悲，在自我检省之后，毅然用死来替自己赎罪。

^① 翁泽生：《谁误汝》，《台湾民报》1923年8月15日。